

文史资料选辑

1979 第一辑

0.6

9/2:1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一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内部发行
文史资料选辑
第一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*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6 字数: 137,000
1979年11月第1版
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20,000
统一书号: 11102·26 定价: 0.70元

再 版 前 言

《安徽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一辑，是一九六四年编辑出版的。为了适应当前需要，现予再版，并改名为《文史资料选辑》。原第一辑中的《关于撰写文史资料稿件的几点意见和要求》，再版时作了必要的修改，改名《征稿启事》。

文化大革命前，我会共征集辛亥革命以来的文史资料一千六百余篇，约六百万字。除已编辑出版的第一辑外，今后我们将陆续编辑出版有关安徽的近代史、现代史、革命史的资料。

对本刊的征稿、编辑和出版工作，欢迎各方面人士给予大力支持并提供宝贵意见。

编 者

一九七九年五月

目 录

新桂系统治安徽概述·····	张义纯	(1)
桂军五头目轮番主皖的前因后果·····	秋露整理	(20)
新桂系统治安徽初期的片断回忆·····	陈良佐	(32)
桂系二十一集团军在安徽·····	李盛宗	(48)
桂系培养新爪牙的“干训班”·····	吕祖杰	(55)
从“皖干团”看新桂系内部的矛盾·····	哈庸凡	(64)
新桂系与C.C.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·····	苏 民	(76)
桂系争权夺利二三事·····	程中一	(99)
新桂系在皖的搜刮机构—— “安徽省货检处”和“立煌企业公司”·····	吴怀民	(106)
李品仙盗掘楚王墓亲历记·····	邓峙一	(114)
李品仙贪污搜刮片断·····	韩钧衡	(118)
我所知道的汤恩伯在苏鲁豫皖边区的罪行·····	陶子贞	(121)
日寇窜犯大别山与“立煌”沦陷·····	刘立道	(130)
“立煌”沦陷纪实(节载)·····	周虎青遗稿	(143)
安徽沦陷地区日伪组织实况·····	李用宾	(157)
附 载:		
关于《安徽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一辑的订正和补充·····		(169)
征 稿 启 事·····		(179)

新桂系统治安徽概述

张 义 纯

我已年近七旬，又没有文字修养，写作甚感困难。为了响应党的号召，竭尽棉力，把新桂系①统治安徽时期，我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真实情况写出来，提供参考。

我出身于陆军，解放前在旧军队中生活数十年，在皖虽曾一度当过伪省政府主席，但为时短促。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，有很大的局限性。这篇记述，挂一漏万，势所难免。

安徽旧省治在安庆，一九三七年冬，抗战形势恶化，始由安庆迁往六安。日寇进攻武汉，又迁往“立煌”②。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，省会改设合肥。及至蒋介石发动内战，节节败退，合肥人心浮动，复于一九四八年迁回安庆。不久，再迁皖南休宁县属

①广西地区，在北洋政府时期，有以陆荣廷为首的军阀集团；在国民党反动派时期，有以李宗仁、白崇禧为首的军阀集团。他们对于当时中国的政局，都曾发生过很大的影响。为了便于区别，人们称前者为旧桂系，后者为新桂系。——编者

②金寨县为我鄂豫皖边区革命老根据地之一。早在一九二四年，在陈潭秋、董必武、肖楚女等同志的领导下，这里就建立了共产党组织。一九二八年初，党领导广大农民，组织武装起义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。一九三三年四月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强反动统治，将六安、霍邱、霍山和河南省的商城、固始等五县边区划出置县，称为“立煌县”，县治设金家寨。解放后，改称金寨县。本篇为了叙述的方便，仍沿用“立煌”的名称。下同。——编者

屯溪镇。今以伪省政府迁治为纲，分为五个时期，略述新桂系统治安徽的经过。

一 省治在六安时期

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后，主持安徽省政的多为外省人，伪中央对握有兵权的军事头目无地安排时，便将皖省地盘给他，好象火腿一样，当作礼物送人。他们来皖均怀着罪恶目的，专以榨取人民血汗为能事。这种情况，前后达二十余年，与国民党的反动政权相始终。

抗日战争发生时，任伪安徽省主席的是蒋作宾。时省治在安庆。蒋惧敌，不敢扼江而守，因将省政府迁往六安。不久，蒋辞职，省政府改组。

上海抗日战争开始，广西军队动员编组，陆续开往徐州、蚌埠一带参加抗战，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，安徽属五战区管辖，伪中央即以李宗仁兼任安徽省主席。表面上是说以政治配合军事，有利于抗战；实际上是给广西李、白集团一个地盘，以示牢笼。其时我任第四十八军副军长，由上海抗战转进至浙江于潜县。奉李宗仁电召往徐州，告以安徽省府改组，拟以我担任民政厅长，代理主席职务；同时，第四十八军军长韦云淞调任第三十一军军长，发表我继任四十八军军长。我揣测他的用心，是因为我是皖人，又与桂军有历史关系，以我来主持省政，更便于实现他们扩张地盘——把安徽变成第二广西的野心。一九三八年二月，我与李宗仁同在六安宣布就职。

在这里，我与新桂系的关系，简单地补叙一下。一九一六年，我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后，被分配在北洋政府军队里服务，前后达十年之久。一九二四年，福建臧（致平）杨

（化昭）事变发生时，我是陆军第二十四混成旅第二团团长，兼第一支队司令官。为了反对曹锟贿选总统，曾从福建打到浙江，紧接着又参加了江浙战争，在北洋军队中成了一名所谓“干员”。可是我感觉到这样干下去不是办法，为了自己的前途，在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，我离开北京，投入国民革命军，由第六军军长程潜派我做副师长，率领安徽军队两团（王普第三旅）进攻南京。不久宁、汉分裂，程潜去汉口，杨杰继任第六军军长，军队改编，我与李明灏等同时辞职。随后，陈调元约我随军北伐，我同他一起进军到了山东郯城。是时，白崇禧任国民革命军第二路总指挥，陈调元、杨杰两军均归白指挥。陈、杨二人在与白谈话中常提到我，并多称许之辞。适李宗仁新成立的第十九军（由湖北刘佐龙的部队改编而成）需人整训，经白崇禧的推荐，调我前往充任该军第二师师长。我从山东回到南京，转往芜湖，与李宗仁见面，李为我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就职典礼。我与李、白素昧平生，他们对我如此重视，使我内心里起了“知遇”之感。从此，我就以一个安徽人死心塌地地充当了新桂系的工具，身居要职，前后近二十年，十分自然地成了新桂系军阀中一个重要成员。

安徽省府迁至六安以后，内部作了局部改组，仅更动民政厅长和秘书长，其余仍旧。有章乃器者，随同李宗仁来六安，被任为省府委员，因旧秘书长辞职，遂派章代理秘书长，我以民政厅长代理主席，财政厅长为杨绵仲，教育厅长为杨廉，建设厅长为刘貽燕。省府会议认为皖南已划归第三战区，又有长江阻隔，管理不便，遂决议设立皖南行署，并派省府委员戴戟任行署主任。戴原籍皖南，以他任皖南行署主任，人地比较相宜。皖省计有六十三县（皖北四十县，皖南二十三县），当时除已沦陷的县份外，尚有三分之二的县份在省政府管辖之下，政令尚可通行。

抗战军兴，国民党各派系和地方势力纷起活动。其中亦有少数爱国人士；但大多数都以本身利益为前提，互相排斥，明争暗斗，周旋应付，煞费苦心。李宗仁以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安徽省主席。在安徽境内的广西军队，还有两个集团军总司令，对于政治也各怀野心：一个是十一集团军李品仙，驻寿县；一个是二十一集团军廖磊，驻合肥。最明显的是李品仙，当皖省府改组时，曾公开要求作省府委员代理主席。李宗仁、白崇禧因我是皖人，故调我为民政厅长代理主席。这种内幕情形，我起初是不知道的，后来竟成为种种困难的主要原因。

为了发动民众配合军队抗战，第五战区曾经在徐州组织了一个“动员委员会”。皖省府改组后，李宗仁即在六安组成“安徽省动员委员会”。委员人选，来自多方面。第一次会议，推举我为主任委员，并由我就委员中推出章乃器为秘书，其他如常恒芳、光明甫、沈子修、朱蕴山、朱子帆等都是委员。动员委员会中，有不少进步人士，而省党部则多是C.C.分子，因而会、部之间矛盾重重，形成对立。

安徽省府的改组，名义上既是为了配合抗战，那么随着战事的发展，必然有一些“新政”设施。首先是军政干部人员的开始训练。在六安北大营设立一所“军政基层干部人员训练班”，由我兼班主任。参加受训的军事干部，多是保安团队初级干部和军士，政治干部多是青年学生，训练期满后，派当乡村干部。每期训练人数约三千人。此外，省府各部门的行政人员，也施行军训。

安徽保安处原辖有保安团六个团，在上海战事紧张时，因前线士兵伤亡众多，奉伪中央电令，以安徽保安团全部开沪补充前线缺额。以后，我复由各县地方自卫队中抽选士兵，补足保安团队。

省政府改组后不久，奉伪中央命令，成立了“安徽省军管区司令部”，办理兵役事宜，由省主席兼任司令，我为副司令。司

令部成立后，即筹设“兵役人员训练班”，以训练干部，办理兵役业务，此为抗日时期安徽设立征兵机构的开始。由于办理不善，弊窦丛生，滋事扰民，莫此为甚。

随着抗战俱来的困难，不一而足。津浦铁路南段在皖境内者，多被日寇侵占，难民纷纷向省府所在地六安奔集。民政厅乃在六安设立难民收容所^①，办理收容事宜。以后越来越多，遂分散安置于各乡村。儿童则交伪中央在六安设立的保育院教养，并陆续向后方输送。有一次，输送难童的大卡车，在湘桂交界处过渡黄河时，因司机失慎，连人带车翻堕水中，全车儿童同罹惨劫。迄今思之，犹有余痛！

抗战形势愈逼愈紧。我就职之后，即于颍、亳、寿一带（皖北各县）开始武装民众，以配合正规军作战。皖北各县人民素有“淮上健儿”之称，抗日情绪颇高，即使编组十万武装部队，亦有可能。惟民生憔悴，饷糈不易供给。我斟酌情况，除各县原有自卫队外，决定大县编组一大队（三个中队为一大队），中县编组两中队，小县编组一中队。武器兵饷均由各县自给，但须县府负责统筹。当时安徽抗日自卫军共成立五路，石寅生、岳相如、余亚农、宋邦翰、张节分任各路司令（以后有更动），五战区长官部委我兼任安徽抗日自卫军总司令。为了节省经费，我决定以全省保安司令部的机构和人员兼办自卫军业务。

台儿庄战役后数月，敌寇增调部队，向徐州发动大规模攻势，我军不支，阵地向后转移。李宗仁退至阜阳，召廖磊、李品仙和我前去开会，商讨今后行动。我以在六安暂维政局，任务艰巨，现既告一段落，遂婉言辞职，仍愿回军队服务。并对李宗仁说：“我虽辞职，但仍负责将省府全部迁至‘立煌’，俟安排妥当

^①当时难民收容所收留的所谓“难民”，大部分为官僚、地主、资产阶级的家属，劳动人民是很少的。——编者

后，再离开省府。”

斯时，前线军队纷纷向后撤退，敌寇亦渐向六安进逼。我回六安后，遂命令省政府各厅、处向“立煌”迁移。省府经过苏家埠，到了麻埠（距六安四十五公里），暂住一日。此日发生一件惊人的事故，即随省府行动的一个特务营忽然叛变。这时章乃器已任财政厅长。他跑来对我说：“听说叛兵要抢银行，又要找财政厅要钱。”我安慰他说：“一切由我负责，你不必惊慌。”特务营直属于保安处，担任省府警卫勤务，故随省府行动。此次叛变，系因新任营长杨毅生要点名发饷，第三连空额多，连长（姓名已遗忘了）怕点名，遽然跑到营部行凶，枪杀了杨营长。这时，正值全营官兵早晨出发，该连长即胁迫各连随同叛变，谓：“营长打死了，大家都要遭到省府处分。”官兵莫明其妙，相率出走。我得消息后，立即派员分头前往晓谕官兵：“除第三连连长一人外，余均无罪，速回省府勿误。”各官兵正在徬徨疑惧之中，听了我的传谕，遂相率归来，只第三连连长及一号兵畏罪逃亡。

省府迁至“立煌”后，我即电老河口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）报告李宗仁，并继续申请辞职。李回电准我仍回四十八军任军长原职，省府职务暂交秘书长朱佛定代理。我所以辞职，有三个原因：1.省府及保安司令部人事复杂，我系代理主席，无权调整，办事掣肘；2.大别山区系军事区域，没有直接掌握兵力，政令难以推行；3.日寇正调动军队进攻武汉，我原系四十八军军长，自以回任为宜。

二 省治在“立煌”时期

朱佛定以秘书长代理省政，为时短促，不过维持现状而已。

省府迁至“立煌”后，六安县治不久也沦陷了。战事日益紧张，日寇西向武汉进攻，第二十一集团军奉命参加武汉会战。第四十八军和第七军均隶属二十一集团军。这时四十八军司令部已转至麻埠（六安县属），军部派队来接，我即随往麻埠就职。所辖三师，即贺维珍的一百七十二师，张光玮的一百七十四师，区寿年的一百七十六师。四十八军在桂林时我任军参谋长，在上海抗战时我任副军长，现来麻埠任军长，已是三出三进了。

在麻埠驻扎不久，便奉命开往潜山、太湖、宿松和湖北黄梅一带，与来自南京向武汉进攻的日寇作战，以阻其前进。及至广济，便进入防御阵地，参加保卫武汉大会战。如以兵数对比，在上海作战时是五对一，武汉会战时是三对一，我军人数均超过日寇。但由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，在指挥作战、武器装备以及士兵训练等方面，均较敌军相差甚远，故终无法阻遏日寇凶锋，武汉仍不免于沦陷。

一九三八年八月武汉失陷，第二十一集团军奉命留在敌后，以大别山区为根据地作“游击战”。于是第四十八军开回英山、霍山、六安一带驻扎，后来陆续扩展至十余县，军部设在英、霍山间的深沟铺。第七军则分布于鄂东黄安、麻城、罗田、黄冈一带，军部设在滕家堡。其时，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亦驻在英山县城。日寇探知我军留置武汉后方，以大别山区为根据地，处在南京、汉口之间，认为是心腹之患，乃派遣劲旅深入山区扫荡。经罗田，七军避而不击（第七军军长张淦），日寇即进攻英山，二十一集团军总部遂转移至“立煌”（这时总司令廖磊已被任命兼任伪安徽省主席）。仓猝之间，弹药未及运走，概行焚毁。廖磊由“立煌”给我电话，谓日寇已至英山，仍继续前进，着速派队迎击。斯时，一百七十六师师长区寿年驻霍山，一百三十八师师长莫德宏驻麻埠（四十八军原辖一百七十二、一百七十四、一百七十六

三个师。武汉会战后，三十一军军长韦云淞将一百七十二、一百七十四两师带回广西〔1〕，在桂林布防，改以一百三十八师归四十八军指挥）。我立即派一百七十六师丘清英旅赶往迎击，丘旅遇日寇于英山河池镇，激战一昼夜，次日拂晓，我军另派部队迂迥至敌后，敌始后退。

武汉会战后，廖磊和李品仙两总司令争夺安徽省主席甚烈，廖以白崇禧的支持而获胜，李遂率十一集团军往襄、樊一带布防，并兼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（还有一个副司令长官是孙连仲）。廖、李原在唐生智军中同事，一九二七年宁、汉分裂，唐生智被李宗仁击败，部队改编，廖、李皆归附新桂系，升任军长。廖性急躁，李阴险，两人素有矛盾，形同水火，各立门户；幸各当一面，表面上尚可相安。抗战期间，广西军队的军需大权操于总部。廖任总司令时，军队节余的兵饷，多缴归广西增购军火；李则贪财好利，军中节余尽入私囊。廖常以此攻讦之。廖来“立煌”就任省主席，我辞民政厅长，仍留任省府委员，平时省政会议，照常出席。这时，陈良佐任民政厅长，章乃器任财政厅长，方治任教育厅长，蔡公望任建设厅长。省府人事主要分为两派，互相斗争，极为尖锐。

军部到了深沟铺后，官兵多发生疟疾，我亦疟疾大发。病尚未愈，廖磊命我率部队两团，往皖北各沦陷地区，代表省府“宣抚民众”。我自六安出发，经寿县、颍上至阜阳。适第五路抗日自卫军司令余亚农由“立煌”回防，行至三河尖，被一广西籍的游击司令扣押，并劫去饷银。我了解情况后，即派一个广西籍的参谋前往接护余亚农来阜阳，仍令回亳州任自卫军司令原职。我由阜阳巡视太和、亳县、蒙城、涡阳、怀远、颍上诸县，经正阳

注〔1〕 见正文后面“附载”“关于订正部分”（下同）。

关到霍丘。这些地方沦陷以后，残破情景，触目惊心。最突出的是淮北大水，人民惨罹浩劫。一般民众都以为黄河决口是敌寇所为，因而增强了对敌寇的仇恨。哪知事实上是蒋介石在撤军时下令在花园口决黄所致！平畴千里，一片汪洋，人民的生命、田庐、牲畜，损失不可胜计，所受灾难，胜于敌寇的劫杀。我初亦无所知，此时身临其境，瞥见遍地大水，到处都是灾民，才知淮北人民所受苦难的深重。

安徽抗日自卫军，是省府在六安时期成立的。武汉会战后，白崇禧欲就此基础加以整编，改为“游击”部队，以便掌握利用，嘱我主持。我因不愿离开正规军，婉言辞谢，遂由廖磊负责。廖以自卫军全系安徽土著民兵，深恐同他们同床异梦，不利于自己对皖省的统治，遂由桂省调来许多绿林出身或弁护出身的军官，担任“游击”司令，分驻在大别山外围地区，原有自卫军各司令及各级人员全部更换。自卫军本身带有地方性，枪支亦多私有，一旦人事变动，军心涣散，新委司令又不善于掌握，遂不免骚扰地方。嗣因各县长相继向省府反映，都不愿负担经费，廖磊病故后，遂由省务会议决定，撤销游击部队组织，所有士兵及枪支仍分别交还地方，编为县自卫队。

安徽省，中隔长江，有皖北、皖南之分。抗战不久，长江航运为日寇所控制，常有敌舰往来巡查，交通梗阻，省政管理极感不便。省府决定，设立渡江管理机构，附有少数武装维护南北交通。每当夜晚，乘敌不备，派船渡江，主要得力于民众帮助，往返尚为便利。

廖磊担任省府主席，时间很短，一九三九年冬，患脑溢血症死去。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老河口，闻廖病故，急电调我代理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职务，省政则由民政厅长暂行代理。一九四〇年一月，李品仙来“立煌”，就任第二十一集团军

总司令及安徽省主席之职，带来一批湘籍人员，作为骨干。因第二十一集团军全系广西官兵，他省人不易插入，遂多安插在党、政方面，其重要人物有苏民、杨绩荪等。安徽党、政双方，过去常有磨擦，伪中央为利用李品仙起见，派他兼任省党部主任委员。于是安徽党、政、军大权遂操于李品仙一人之手。

李品仙发表为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时，我亦同时被任为副总司令，住总部（在“立煌”）。第四十八军军长由一百七十六师师长区寿年继任。为了培养新爪牙，李颇注意政治干部的训练。省府干训班，由李自兼班主任。总部方面有一个第五战区训练分团（每战区都有训练团，第五战区训练团设在老河口，“立煌”设分团），抽调各军军官前来受训，每期为三个月。

一九四〇年冬季，我以大别山防区安谧，为视察部队整训成绩和社会情况，曾出勤一次，自“立煌”出发经外围各县巡视一周，如岳西、霍山、舒城、桐城、潜山、太湖、宿松、罗田、黄冈、麻城、黄安、固始、商城、霍丘、六安计十五县，行程千余里，历时两阅月。深深感觉到在抗战初期，军队仍能按月发饷，物价比较稳定，前途似尚有可为。以后贪官奸商，囤积居奇，上下交征，“法币”贬值，物资缺乏，民困日甚，社会生机就完全被窒息了。

一九四一年春以后，李品仙自觉人事布置差不多了，防区亦尚安宁，他的贪污本性就日渐暴露出来了。在一次闲谈中，他对我说：“到了抗日胜利后，政治走上轨道，即不能乱搞钱了。”从这年起，省府各机构人员逐渐加多，开支日繁，捐税亦随之增加，李品仙在一次省务会议上，公然说：“现在非省刑罚、薄赋敛的时候。”于是政治风气日益败坏，上行下效，聚敛成风。“立煌”设有贸易机构，以罗园仙为局长（罗系湖南人，原为李之经理处长），专门经营商业，与民争利。所有大别山区出产的桐

油、木、竹、茶、麻、生漆、茯苓、猪鬃等等，概行统制，垄断对外贸易，民间收藏，则为犯法。市上日用商品收买一空，然后再高价售出。是年下半年，物价陡涨，货币贬值，军民生活皆受影响。李品仙托言这是全国性的，为抗战时期必然的现象，不是大别山一地如此。此种风气渐渐影响到军队中，士气遂日益衰落，军中常有人怨愤地说：“我们来抗战，难道是为了掩护你们做生意发财的吗？”

李品仙过去所搜刮的财富，大部分存放在香港，日本人占领香港后，颇有损失。李遂在安徽加紧捞取，以为补偿。我想这是李品仙失之东隅取之桑榆的逻辑吧！有广西友人从后方到“立煌”，说李品仙以前驻寿县时，曾盗掘楚王坟墓，劫走许多宝物及墓中大批阴沉木材，先运广西，又转运香港。李之盗窃行为，真可谓心劳日拙！

一九四一年一月，我在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，看到有关皖南一带的新四军渡江北移的伪军事委员会通令。当时皖南隶属第三战区，伪司令长官顾祝同驻上饶。新四军军长叶挺，副军长项英奉命率军北移，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，遭到顾祝同预先布置各军的突然包围袭击，以致叶挺被俘，项英遇难，部分士兵突围渡江。伪军委会反下令宣布新四军为“叛军”，取消其番号。我当时在思想认识上，只觉得国共合作抗日，中途发生“阅墙”，岂不妨碍团结御侮？却不知这是蒋介石阴谋投敌卖国所造成的又一次反共高潮！

一九四二年夏季，我赴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的老河口开会。抗战时期，每战区都设有作战人员训练班，受训人员多是各军、师中级军官，每期三个月结业，由司令长官兼班主任，各集团军总司令或副总司令担任副主任。这一期作战班，我为副主任，住班专任其事。结业后，我又带第二十一集团军在作战班受训的人

员赴南漳县三十三集团军参观（总司令冯治安）。其时，蒋介石到西安召集各集团军总司令开军事会议，李宗仁因我在老河口，拟派我前往。适白崇禧来老河口，又改派李品仙前往，叫我仍回“立煌”坐镇。我虽有怀疑，但不知他们的闷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！我转回“立煌”，李品仙往西安，我又代理总司令。李品仙开会后，回广西一次，约五个月之久。在这期间，“立煌”被敌寇攻陷，惨罹浩劫。

李品仙利用政权，植党行私，凡是他认为“异己”的人，皆在被排挤之列，对我亦不例外。为了排挤我，他和李、白商定，将我与刘和鼎对调。刘亦皖人，系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三十九军军长。于是刘率三十九军来到大别山区，接防八十四军防地。军部住滕家堡，莫树杰（八十四军军长）率八十四军开赴老河口驻防。我回“立煌”后，以将去之身，代理着总司令的职务；第七军军长张淦已先李品仙请假回广西去了，副军长程树芬调任鄂东游击总指挥，军中无人主持；三十九军又是初来接防。此时如果日寇突然向“立煌”进攻，各军各师是否效命？我能否指挥如意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。今天回忆往事，他们哪里有丝毫抗战的思想，无非是拥兵割据而已！

“立煌”沦陷，在当时是一件大事。先是日寇侵华军总司令畑俊六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，汉口日寇司令攻田冢参与会议后回汉，飞经大别山区（黄梅、宿松一带），我军高射炮队正在演习，瞥见有敌机飞经上空，瞄准射击，凑巧一炮命中，敌机被焚，堕入深山，当时因日暮亦未搜获。汉口日寇以攻田冢飞机未返，又听说有一架飞机被我方击落，当即派遣部队进入大别山区，分头寻觅，时经数日，始在黄梅山中寻获攻田冢死尸，拟即转回汉口（据鄂东游击部队报告如此）。我鄂东防区部队，对此进入山区的敌寇，始终避战，不发一枪，启寇轻视，敌寇遂乘机增派部